



秦文化发祥地探究

■ 欧阳坚

秦人从哪里来,秦早期在哪里活动,其文化特质是什么,是研究秦朝如何兴起及对大一统国家的贡献绕不开的课题。近年来,甘肃一批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使揭开这些历史迷雾成为可能。

据史料记载,秦人族出东夷,其始祖伯益为帝舜虞官,又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并列为继承人。大禹去世后,伯益被大禹之子启所杀,启建立夏朝后,其部族遭到打击并迁移流散。夏末,嬴秦参加商夷联军灭夏并进入关中,由此成为商朝的显贵,“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商末,崛起于关中的周人在灭商活动中,追随商王的嬴秦首当其冲,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并迁移各处:嬴秦首领中湫被迫归周并西迁陇右礼县一带,“在西戎,保西垂”;中湫之子蜚廉逃往嬴姓故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商奄。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杀蜚廉,并将参与叛乱的嬴姓商奄之民迁往“朱圉”,即今甘肃谷县一带。至此,嬴秦在经历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的起伏动荡和迁移流散,终于在甘肃东部定居下来,开始了其族体形成和兴起建国的早期历史。

从商末中湫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东迁关中,在整个西周近三百年间,嬴秦共14代一直生活在甘肃东部地区。其首领依次是中湫、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这是秦人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和秦文化的形成期,具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湫到大骆七代是嬴秦族体的形成阶段。嬴秦初入陇右,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一方面是自然的挑战,当时的陇右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山大沟深、林茂草丰,半农半牧区的环境和条件与黄河中下游平原农耕区迥异。另一方面,他们来到陇右也就进入了以畜牧见长的当地土著西戎部族领地,如何与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西戎相处并得到认可与接纳并非易事。但经历多次生死考验和动荡迁徙磨难的嬴秦,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凭借“懂鸟兽之言”、善御和熟悉山林草木的技能,因地制宜发展农牧经济,入乡随俗,主动交好西戎,并通过联姻通

婚、学习骑射本领、经济交流和文化往来,不仅得到西戎的接纳,而且实现了和睦相处,很快在陇右站稳了脚跟。秦人族体随之形成,秦文化也在相互交融中得以孕育。

第二阶段从非子到庄公五代是秦人“邑秦”和秦文化形成阶段。非子为大骆的底子,嫡长子为成。非子善养马被周孝王征召在今宝鸡的汧河与渭河之间为周室养马,“马大蕃息”。非子因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让其在“秦”即今清水县城北李崖村建立新邑,秦人称秦由此而始。非子获姓受封是嬴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秦人也从此在陇右一分为二,非子之兄成继续以西犬丘为居地活动于西汉水上游,非子一支则来到渭河支流牛头河流域,以秦为中心开辟了一块新居地。非子之后,经秦侯、公伯至秦仲,“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命其反击西戎,反被杀。周宣王支援兵车七千,又名秦仲子庄公伐戎获胜,并收复犬丘,被封为“西垂大夫”,庄公率秦人由秦邑迁入犬丘。秦人反击西戎获胜和在周室地位的上升,正是秦人实力快速上升的结果,史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秦文化也在与周人、西戎的交流中初步形成。

秦人在天水的第三阶段是襄公和文公两代的建国与东迁。公元前771年,西戎攻破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秦襄公力战救周,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因功被封为诸侯,赐予岐丰之地。于是秦襄公建国,四年后,秦文公继位,文公三年东猎,一年后(公元前762年)到达汧渭之会(今陕西省宝鸡市),宣布迁都于此。两代秦人在完成建国夙愿后,迅即东迁,开始了秦人建立霸业、一统天下的历史进程,四百多年后,秦完成统一。

我们循着秦人西迁和兴起的时空轨迹不难发现,秦人的历史和发展道路极为独特,它既有极为曲折漫长的西迁历史;又有在陇右西垂族体形成、文化生成和重新兴起建国的独特经历。多难的部族命运和特殊的生存发展环境都赋予秦人发展和文化创造极为深刻的影响。经受了充满生死挑战

和颠沛流离考验,迈过了千难万险浴火重生的秦人,磨砺出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追求,实用功利、尚武刚毅的生存能力。这些意志品格、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秦人与生俱来的精神谱系和文化基因,为秦人一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发展壮大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文献记载的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创造活动已被近年来甘肃东部地区的秦文化考古发现所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甘肃东部地区大量与秦早期历史和秦文化相关的遗址和墓葬,陆续被发现和发掘。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甘肃省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启动的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经过十多年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在渭河上游天水、定西地区发掘秦早期与西戎文化遗址8处,仅清水县牛头河流域就有秦文化遗存31处,发掘2处;在礼县西汉水流域发现秦早期文化遗址38处,发掘6处。这些重要发现,使长期模糊不清的秦人早期历史终于露出真容,为秦早期文化研究和进一步探究秦统一的文化原因提供了可信资料。

在甘肃发现的秦文化遗址,提供了秦人早期历史的重要线索。已发现的遗址年代,上起西周下至秦朝,聚落、都邑、城市、墓葬、祭祀、礼制等遗址和车辆、乐器、各种金属器具和陶器等遗物的出土,商式风格陶器的发现,共同印证秦人系西迁而来,兴起、建国于甘肃地区。大量遗存从制度、经济、社会生活、城池、建筑、礼仪、丧葬、习俗风尚、器用等多方面,立体地展示了其文化的多姿多彩,为揭示秦文化早期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遗址的交错分布,保存了秦与西戎交往交融的活标本,为探究秦戎民族融合与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不难看出,历经磨难的秦人西迁甘肃后,在西戎与周人的夹缝和全新的环境中,因地制宜,兼容博采,实现了兴起与建国,也开创了自己的文化,熔



铸并形成了其坚忍不拔、昂扬向上、果敢勇猛、实用进取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品格。这一生态和文化塑造了秦人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成为其文明底色和文化基因,蕴含于上述遗址遗物的深层内涵,为揭开秦人性格和完成大一统的文化密码提供了重要凭借。

秦人挟此文化优势进入关中后迅速崛起,以秦穆公称霸西戎为标志而进入诸侯大国的行列。此后,献公、孝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励精图治、发奋改革,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实现了军政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秦文化既实现了转型,又在兼取农耕、畜牧文明和博采六国文化精华中推陈出新,形成尚武与崇法相结合的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国家强盛奠定了基础。于是,从秦孝公到秦嬴政七代秦人致力于秦国强大,一百余年间国力大增,进而扫灭六合,完成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

概括起来,秦人族体形成于甘肃,秦文化孕育于甘肃,秦人建国于甘肃,甘肃是秦人、秦国、秦文化的发祥地。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

(原文刊载于《新华文摘》2022年第17期)



悬泉汉简,让历史告诉未来

■ 张德芳



1990年—1992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2.3万余枚,另有其他各类遗物6000余件、各类陶器残片3万余件。就出土汉简而言,是继斯坦因1907年、1914年两次在敦煌汉塞发现敦煌汉简,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

悬泉汉简与出自边塞烽燧的敦煌和居延汉简不同的是,悬泉置是当时一座官方的邮驿接待机构,而且坐落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功能性质的不同决定了遗留下的简牍文书主要属于丝绸之路东西交往的记录,对我们研究西汉时期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交流,至为重要。

一、两汉丝路繁荣的标志

悬泉置遗址坐落在今瓜州、敦煌两市市的交界处,准确坐标为北纬40°15'54",东经95°19'45"。南面是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涧有悬泉水汨汨流出,两千年来依然如故,至今涌流不断。北面有疏勒河流过,并有从东到西的汉塞和烽燧以为北部屏障。

悬泉置的全称应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从全称中可以看到它的隶属关系。基本设施为一座50×50米的用土坯砌筑的院落,院内有28间大小不等的房屋,院外还有马厩等一些附属建筑。编制为“官卒使御”37人,定额马40匹,传车10~15辆,此外还有牛车3~5辆,养牛若干。有悬泉置啬夫负责全面工作,另有悬泉置丞、置佐以为副贰协助工作。其他附属机构还有悬泉廐、悬泉厨、悬泉传舍、悬泉邮、悬泉驿等。功能和职责主要是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的各级官员和西域使者。

按照汉简的记载,像悬泉置这样的机构在当时的敦煌郡东西300千米的交通线上分布有9座,依次是渊泉置、广至置、效谷置、离泉置、悬泉置、遮要置、龙勒置(可能还有玉门置和冥安置),每30千米一处。

按照里程简的记载,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到敦煌的路线应该是经今陕西西平之境之茂陵,过乾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再经长武进入甘肃东部的平凉和宁夏南部的固原,再进入甘肃靖远、景泰,横穿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

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线,里程简中记载了46处(包括敦煌郡的9处)停靠站点。而这些停靠站点的每一处都应具有类似悬泉置这样的功能和规模

设施。正是这些沿途的馆舍邸店,保障了两汉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

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网状的,纵横交错,可以随意行走。其实不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没有这些保障设施,像丝绸之路这样的长距离交通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对悬泉置的解剖,我们可以看到这46个停靠站点的整体形象。它是当时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的基本保障,是汉帝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不光在西北边疆,而且在内地,在东北,在南海,在西南,像悬泉置这样的机构广泛分布,保障了汉王朝对内地和边疆的有效管理。

二、研究两汉与西域的原始档案

历史上狭义西域主要指阳关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约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地区最初有36国,后来分为50多国。悬泉汉简中有其中30多个国家的记载,主要是朝廷派官员出使或者上述国家前来京师路过悬泉置的记录。西域来汉的人员中有国王、王后、使者、副使、质子、贵人、部落酋长、随行人员等,来汉的目的有受封、朝贡、纳质、通使、和亲、学习、游历等。

50多国中,有48国属西域都护管辖,其中南道17国,中道15国,北道16国。另有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身毒等7国,在今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不属于都护。

南道17国主要分布在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其中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汉简中有记载。

中道15国,从东往西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和天山南麓,渠黎屯田和西域都护府就在这条线上。汉简除对西域都护的活动有大量记载外,还对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犂、乌垒、轮台、龟兹、姑墨、温宿、疏勒、大宛等12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

北道16国,乌鲁木齐以西至伊塞克湖等辽阔地域是乌孙的游牧之地,乌鲁木齐以东从东到西是车师六国和其他小国。北道诸国中乌孙最大,有户12万,有口63万,胜兵18.8万。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乌孙。汉对匈奴的节节胜利实际上伴随着汉与乌孙的出使、和亲、结盟、分封的历史过程,三者的关系深刻影响了西域历史的发展。

汉简中关于汉与乌孙的和亲、公主回返、长罗侯常惠多次出使、赤谷城屯田、冯夫人锦车持节完成朝廷使命、乌孙大小昆弥分立以致分别到京师朝拜,都有相当具体的记载。

另外,汉简中关于车师的记载也极为重要。比如车师前国在交河城,是进入西域的东部门户,汉与匈奴曾有过“五争车师”的战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从此掌握了控扼西域的主动权。车师屯田、伊循屯田和渠犂屯田以及在乌孙的赤谷城屯田,形成了西汉在西域的驻兵和屯田格局,有力地保障了西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总之,汉简中关于上述30多个西域国家的记载,对研究历史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今天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和维护祖国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源头

大宛,张骞出使的第一个西域国家,地处费尔干纳盆地,属今乌兹别克斯坦,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8世纪,该地区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水利灌溉,有完整的城市设施,属农耕定居的城郭之国。

据说,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在盆地西面出口处的列宁纳巴德(苦盏)修建过亚历山大城,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辐射到了盆地之中。张骞到来之前,这里已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汉简中关于大宛的记载,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和关系的重要资料。

康居,张骞出使的第二个国家,地处锡尔河北岸,大部属今哈萨克斯坦,势力强盛时可能包括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农耕地区,亦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大国。汉简中关于康居的记载极为丰富,不仅是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大月氏,战国秦汉之际活动在阿尔泰山以东、蒙古高原西部,东达黄河沿岸,势力远超匈奴的游牧部族。后来因势力衰弱受到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先迁伊犁河流域,再迁阿姆河流域,最后臣服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巴克特里亚)而定居于此。张骞第一次出使就是要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

大月氏虽然未能按照汉朝的意图东返故地,但它

在阿富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定居后得到逐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贵霜帝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与罗马、波斯、汉王朝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悬泉汉简中关于大月氏的记载,主要反映了贵霜帝国建立以前公元前、后半个世纪里大月氏及其所属五细侯的情况。在中亚史上,这段时间由于资料缺乏而被称为“黑暗时代”,悬泉汉简的材料则是这段黑暗时代闪烁的星辰。

乌弋山离,是安息东部德兰努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个行省的地盘,以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锡斯坦为中心,西到兴都库什山,东到克尔曼沙漠。实际上地跨阿富汗和伊朗两境。悬泉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来汉的记载,说明汉朝与西亚的关系已远达伊朗高原。

罽宾,大月氏西迁中亚后迫使塞人南迁建立的一个国家,在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塔克西拉(但叉始罗)。此地虽四面环山,但山间盆地的自然环境良好,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工业基地,也是2000多年前的佛教圣地。根据史籍和汉简的记载,地处南亚次大陆的罽宾,早在2000多年前就同汉朝有了相对固定的来往关系。

四、汉简中关于佛教的东来和儒家经典等汉文化的西传,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反映

悬泉汉简中“浮屠简”的发现,说明大致在公元1世纪的后半期,佛教已经传到了敦煌。由此说明佛教的传播是一个经西域到敦煌再到中原的过程,而非直接越过敦煌到了内地,这对研究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最早传播是重要的参考坐标。

悬泉汉简中《论语》《孝经》的残片以及其他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识字课本的发现,是汉文化西传的有力证据。结合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和罗布泊出土的《论语》简,再结合1990年在朝鲜半岛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论语》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别户口集簿》,可以看到,西汉武帝以后,对边疆地区的开拓和管理除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经济措施外,还伴随着文化上的积极汲取。

悬泉汉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泛。随着整理工作的告竣和全部资料的公布,必将引发一个深入研究的高潮。目前的研究只是开始,上面的介绍只限于几个侧面。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